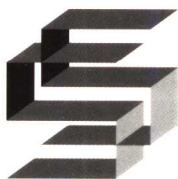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JILIN UNIVERSITY · CHINA



**Research on Coins
in East-Zhou
Period of China**

吴良宝 / 著

**中国东周时期
金属货币
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

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

**Research on Coins in
East-Zhou Period of China**

吴良宝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

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

著 者 / 吴良宝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65286768

项目负责 / 周 丽 (ZhouLi@cass.org.cn)

责任编辑 / 吴连生 (LianSheng Wu@263.net)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21

字 数 / 345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772 - 8/K · 191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 例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东周时期铸行的金属货币，包括铜铸币与金银称量货币，非普遍意义上的铅铸币、鍍金铸币不在讨论之列。

- 本书收集资料的时间下限为 2004 年 12 月。

- 为行文方便，一些征引次数较多的书均使用简称，书末附有“引书简称对照表”以便参看。

- 货币文字中一些常见的异体字，释文均以通行字写出。如“陃”作“阴”、“𠂔”作“半”等。

- “参考书目”的排列，以编著者首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为序。

- 书中引用的货币著录号码，凡未说明出处的，均引自《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 先秦货币》一书。

- 书中所提供的货币图片（包括拓本、摹本）多非原大，读者如需要，可自行核对原始资料。

- 本书所绘表格中的货币数据：长度单位为厘米；质量单位为克。

- 为阅读方便，本书为几种货币配制了地名分布示意图，底图以及地理标位均依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册。图中：“○”表示货币上的地名；“◎”为今县名；“……”表示省界。

- 本书所引用的公元纪年均采自杨宽《战国史》（1998 年增订本）附录三“战国大事年表”。

序

黄锡全

我与良宝博士初次见面大概是在 1996 年。当年 11 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长春举行第 11 届年会，纪念于师思泊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他当时正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参加会务工作。凑巧的是，会议期间我又曾与他同住一室。那时我已从武汉大学调至中国钱币博物馆工作。晚间休息时，他对我谈及喜欢先秦货币，并有意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当时我与他不是很熟悉，因而鼓励了几句。没过多久，我收到良宝寄来的一篇关于先秦货币仿铸问题的论文，感觉有些新意，就推荐到《安徽钱币》发表。1998 年，又陆续见到他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秦布币出土地整理及相关问题探讨》以及几篇有关先秦货币的论文，都有一定分量。更令人高兴的是，他的博士论文也选定先秦货币为题，与我的研究有共同之处。从此，联系就多了起来。2003 年底，良宝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修改，即将交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我在前面写几句话。我感到这是向大家介绍这位年轻学者难得的机会，故欣然应允。

我在拙著《先秦货币研究》前言中谈到，先秦货币不仅时间长、跨度大，离现在久远，而且几乎没有多少关于当时货币情况的记载，知道的越少，存在的问题就越多，需要了解和研究的方面也就越多。但是，先秦货币发展史，时间长度占据整个中国货币史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研究中国货币，如果不研究先秦货币，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然而困难却很大。其困难主要表现在：文献记载有限；货币种类较多；释读货币铭文难度较大；对其研究需要具备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代货币史等多学科的专门知识；近几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

很多重要的新发现,所获得的实物及文字资料,为探讨或解决有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但是毕竟有限;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各人的认识又不尽相同,有关重大的问题至今未能达成一致,见仁见智,等等。拙著《先秦货币通论》与《先秦货币研究》,就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利用掌握的知识,结合近年所见的材料及新的研究成果重新对其进行探索,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是我学习、研究先秦货币新得体会的汇集。但其中还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就是资料相对较多的东周时期的金属铸币也存在不少没有解决或者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良宝博士结合所学专业,发挥古文字学、历史学、地理学之专长,选择东周时期金属货币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又作出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取得了不少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全书按照时间为顺序,将东周时期的金属货币分为春秋、战国两大块,每个时期又按照出现时间的不同而依次加以介绍,轮廓比较清晰。本书在力图全面吸收学术界的最新资料、研究成果,反映当前东周金属货币研究的水平与状况方面下了不少工夫。拙著《先秦货币通论》,资料的搜集大多截至1998年。五年来又有不少新材料及新的研究成果,该文多已涉及或收集。如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空首布范、空首布币名称问题的研究等,就是近期发表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在引用考古新材料、新成果时,书中还自觉地利用金相分析、铅同位素比值等科技成果来为货币的研究服务。

在货币文字释读方面,作者结合所学专业试图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其中的一些考释有些难度。比如:将旧释为“雲”、“塞”的平肩空首布文字改释为“垚”、读作“幾”,认为是卫国铸币;将旧释为“非”的平肩空首布文改释为“析”,将旧释为“袂”、“欸”改释为“歆”、读为“軹”,考释了“良(梁)”字平肩空首布;读平肩空首布中的“鬲”为“栎”、“井”为“刑(邢丘)”、“高”为“郊”、“喜”为“釐”、“兄”为“皇”,读耸肩空首布中的“邢”为“邢(邢台)”、“朕”为“滕”;利用货币文字借用边框为笔画以及讹变等特点,将旧释为“木干”的方足小布改释为“长子”、改释方足小布“子贝”为“郎”、疑《钱典》39的方足小布“口王”为“野王”;释《货系》2961燕“明”刀背文“工行”合文;等等。

在对已有研究意见的取舍方面,比较注意联系同时期的其他战国文字资料。比如,方足小布中的“堊城”,现有“隰城”、“栾城”两种解释;

战国文字中存在“偏旁混同”的现象，金文、战国楚简等资料表明，从“𡗗”的“”应读为“隰”，而从“邑”、“言”、“肉”等旁的从“兹”之字才读为“联”，于是判断小方足布应该释为“隰城”。

在探讨货币形制演变关系方面，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山西寿阳出土的六棱首耸肩尖足空首布，进一步论证耸肩尖足空首布是从中原地区的早期特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币演变来的；二是讨论了几种平首布币的形制关系，倾向圆足布、方足小布，都是由尖足布的晚期形态“类圆肩圆足布”、“类方肩方足布”演变而来，两者在演变过程中没有先后关系的意见。

比较自觉地利用货币出土地资料来为东周货币研究服务这个特点在全书比较明显。以往的研究，多比较注重货币的文字及形制，对于出土地点注意不够。其实，货币出土地点往往能够反映一定问题。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通过统计“明”刀出土地判定“明”刀为燕国所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中国钱币》1995 年第 2 期，通过统计楚大布的出土地点进一步说明这种布币属楚而非属三晋、越或者其他国，也是一例。良宝基于这种认识，在前人所作工作的基础上又对先秦货币的出土地作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并对有关问题作了讨论，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比如：根据“梁冢𠄎百当𠄎”类桥形布从不在山西境内出土的情况，推断这种布币的铸造时间不得早于公元前 286 年；考察“平阴”、“邬”等方足小布出土地情况，推断它们都是赵国货币；根据陕北从不出土魏国方足小布以及魏国铸有“高女一𠄎”桥形布等情况，对方足小布“咎奴”是“高奴”的意见提出了异议，等等。

试图将东周货币与文献的有关记载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也是一个特点。又如，从钱币学的角度来考察《国语》周景王“铸大钱”的历史真实面貌，认为春秋时期的空首布币不存在等制关系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单旗所说的“子母相权”之说确如学者所怀疑的那样有后人伪托的可能。而在文献不足征的时候，则通过钱币本身以及尽量联系其他相关的资料来加以说明。又如，通过考察战国晚期魏国纪质铜器铭文中“𠄎”的质量以及同时期流通的方足小布的实测质量，指出“梁冢𠄎五十当𠄎”、“梁冢𠄎百当𠄎”桥形布面文中的“冢𠄎”是相对于方足小布而言的，桥形布中的“𠄎”只是价值单位而非实际质量；在“梁冢𠄎百当𠄎”桥形布流通的时候，其他桥形布因铸造地为秦占领而多数已经停铸，而“安邑二𠄎”、“安邑一𠄎”桥形布停铸时间最晚，它作为旧币因继续流通，故在背面加刻

“豕”字（当然，这只是作者的初步理解，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还有待证实）。

书中专门设立“战国时期的货币单位”一章，讨论货币单位的有关问题，并初步讨论了战国货币中“铢”的减重问题。在钱币辨伪方面，在裘锡圭先生意见的基础上，详细讨论桥形布“分布”为伪品，同时对“垣铢”、“𠂔(?)铢”桥形布的可疑之处及相关问题也作了细致的考察。

书中也有一些方面尚需进一步斟酌。如：从形制上划分，弧裆与弧方裆尖足空首布时代应该有区别；“分布”桥形布不一定假，最近又有发现，原因有待研究；尖首刀的问题比较复杂，有关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等。

良宝博士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专门研究先秦货币并且卓有成就的年青学者。此书集中对东周时期的金属货币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与研究，涉及多种学科，其成果对于研究中国钱币学、货币史、经济史、古文字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先秦货币的继续深入研究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此书的出版，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前言

一 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的出现与发展概况

自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雒邑，至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这五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史称东周时期。^{*} 这一历史阶段，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都出现了剧烈的变革。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变革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井田制的崩溃和奴隶制关系的衰落”、“从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到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百家争鸣的繁荣与结束”。^① 正是在这样的“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发展、商品交换空前繁盛，金属货币开始出现并登上了历史舞台。

本文所说的“金属货币”，不仅是指金属铸币（如布币、刀币、圆钱等），也包括金版、银布币等金属称量货币。所谓金属称量货币，即按照金属质量进行交易的货币。对于“金属铸币”，有的著作定义为：“将金属铸成特定的形态，打上铸造者的印记，使用者凭此即能知道它代表的金属量，交易时不再需要称其质量。”^② 这是单就战国时期的一般情况而言的。从考古资料来看，春秋中期就已出现的早期空首大布上并不一定都有文字（即所谓“铸造者的印记”），有的面、背部均平素无文。

从金属货币的开始出现到被秦“半两”圆钱统一为止，东周时代的金属货币经过了四百年左右的发展，其时间跨度之长、种类与形制之复

* 东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本文采用《春秋》以公元前 479 年作为春秋时期结束时间的标准。

①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第 371～372 页。

② 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总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 12 页。

杂多样、文字之独特，均为中国历史上所仅有。除了巴、蜀、吴、越、鲁、宋等国使用何种形式的金属货币尚不可确知以外，周王室以及秦、三晋、燕、齐、楚等诸侯国不仅大量铸行金属铸币，也使用金、银等金属称量货币。

中国古代金属货币出现的时间，传世文献中有多种说法。现代古钱学者多数认为金属货币出现于春秋早期。也有的学者认为不早于战国时期，理由是夏、商、西周时期的生产很不发达，剩余产品很少，用于交换的更少，因而不可能有发达的商业，也就没有货币的产生；只有到了春秋以后，社会分化出了一夫百亩的个体经济，到了战国时期分化加剧，私有财产发展，交换逐渐增多，才有了货币的出现。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金属货币在中国出现于春秋时期，已为考古出土资料所证实。比如：199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郑韩故城”春秋中期郑国祭祀遗址的一口长方形的井中，出土了一件特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的铸范以及26件大型空首布范芯，“伴出的还有十分丰富的鼎、簠、方壶、豆、编钟等青铜器铸范”，表明这种形体硕大的空首布的出现不晚于春秋中期^①；在山西省曲沃县天马村路旁断崖上的窖穴内出土两枚平肩弧足空首布，窖穴被旁边的灰坑（属春秋中期晚段地层）打破少许，其时代也不应晚于春秋中期晚段^②；山西省侯马市晋国春秋晚期铸铜遗址中，出土了10万多枚耸肩尖足空首布的范芯^③；在河北省张家口、滦平、北京延庆等地的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了尖首刀币。^④ 这些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古代金属铸币的出现应早于春秋晚期。

按照出现的时间，东周时期的金属货币可分为春秋、战国两大段。下面以时间为线索简要介绍东周金属货币的发展脉络。

现代古钱学的研究表明，春秋晚期中原地区周、郑、卫等国流通使用的是大、中型平肩弧足空首布，今山西汾河流域的晋国铸行的是圆档、弧档型耸肩尖足空首布，而今河北桑干河流域、太行山一带则有狄族

① 马俊才：《新郑“郑韩故城”新出土东周钱范》，《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79～81页。

② 赵云峰：《记山西曲沃县出土的春秋布币》，《中国钱币》1996年第2期。

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侯马铸铜遗址》（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④ 转引自：“林沅：《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95～96页。”

铸造的尖首刀币。^① 齐国在春秋晚期是否已经铸造刀币，目前还不能确定。由此，使用刀币的区域与流通布币的区域大致形成。春秋晚期的这些金属铸币在制造使用的进程中，都普遍出现过形体逐渐变小、重量逐渐减轻等变化，但当时的铸币还不存在二等制或三等制的等制关系。钱币窖藏与随葬钱币的墓葬资料都表明，春秋晚期的这些铸币可以持续使用到战国早期甚至中期。

到了战国早期，一方面空首布还在继续铸造与使用，比如周王室铸造的“安臧”等面文的小型平肩空首布、晋国铸造的方裆型耸肩尖足空首布等；另一方面，开始出现了首部平实的平首布币，比如，由耸肩尖足空首布演变而来的尖足布币等。由空首嬗变为实首（平首）的时间，不晚于战国早期的早、中段之间。战国早期出现的尖足布、桥形布等，已开始实行等制关系。从币文标记的铸造地名与出土地资料来看，尖足布应是赵国的货币，桥形布则是魏国货币。此时铸造的还有韩国以“百涅”纪值的大型锐角布币。

齐国至迟不晚于战国初期即已铸造了“之大刀”刀币。大约在战国早期晚段，出现了与尖首刀形制关系密切的“明”字写法方折的刀币，在天津、河北南部、山东境内都有出土，其国别与铸造者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种刀币在战国中期发展出了具有特定背文的“博山刀”币，一般认为与燕乐毅伐齐有关。

战国早期的尖首刀币在减重的同时，刀首逐渐变窄、刀背变直，流通范围也在扩大，今河北全境、辽宁等地都有出土。战国早期的燕国境内，出现了一种形制与尖首刀币相似、面文为“明”字的刀币，被称为“类明刀”。由“类明刀”进而演变为弧背燕“明”刀，在战国晚期变为方折燕“明”刀。与此同时，中山国也开始铸造“成白”直刀币，并为赵国所模仿，始有“甘丹”等面文的赵国直刀币。^②

到了战国中期，出现了一种首部尖锐如针的尖首刀币“针首刀”，主要出土在今河北北部以及辽西一带；今山西北部则出现了几种形制特异的尖首刀币，有的刀首尖长几乎占全长的三分之一，有的形体特细，柄部仅

① 黄锡全：《尖首刀币的发现与研究》，《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150～154页。林沅：《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95～96页。

② 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第221页。

为0.3厘米。^①齐国继“之大刀”刀币之后出现了“齐大刀”刀币，这是战国时期田齐政权的铸币。从历次出土情况来看，“齐大刀”在出土次数以及绝对数量上都居于主要地位。

尖足布币在铸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类方肩方足”、“类圆肩圆足”形态，即耸起的肩部逐渐变平、尖锐的两足逐渐变钝，这两种形态进一步演变为战国中晚期的方足小布与圆肩圆足布。战国末期的赵国还在圆肩圆足布的基础上铸造了三孔布，并采用了“朱两制”。战国晚期是方足小布鼎盛的时期，韩、赵、魏、周铸造的方足小布面文多达110余种，铸造城邑遍及今河南、山西、河北，旁及内蒙古、陕西等地。北方的燕国也在三晋的影响下开始铸造自己的方足小布。布币行使区域扩大到燕境内的内蒙古、辽宁一带，与此同时，刀币区也扩展至赵国的今山西北部、河北境内。

战国晚期早段的魏国在丢失今山西的多数领土之后，在国都大梁先后铸造了“梁冢釐”与“梁正币”桥形布。在“卢氏百涅”等大型锐角布之后出现了一种小型锐角布，目前仅见到两种面文，其铸造国尚未得到确认。南方的楚国也铸造了燕尾布与连布布币，出土地资料表明其铸行时间是在战国中晚期。

战国中期新出现的金属铸币还有圆钱与铜贝。圆钱有圆穿、方穿之别，前者的铸造时间较早。目前发现的魏、赵、周铸造的都是圆穿圆钱，其面文内容或记铸造地、或记铸造地与币值，一如它们铸造的布币。秦国的圆钱只记币值，面文主要有“半两”等，目前出土的以比较晚出的方穿型居多。随着秦国势力的东扩，燕、齐两国在秦方孔圆钱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方穿圆钱，时间是在战国晚期。铜贝只在南方的楚国铸行，面文有“巽”字等，共有10余种。从出土地资料看，主要流通于战国晚期的楚境内。金相分析结果表明：铜贝的铸造质量与铸造时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即越到战国末期，随着楚境的日见萎缩，铜贝的质量也越低劣。^②

战国中晚期，黄金、白银也是重要的称量货币。湖北荆门出土的包山

① 唐晋源：《山西定襄出土异形刀币》，《中国钱币》1997年第2期。黄锡全：《记山西北部发现的两批战国小刀币》，《中国钱币》2003年第2期。周祥：《试论尖首刀》，《中国钱币》2003年第2期。

② 汪昌桥、周卫荣、吕长礼：《楚铜币出土调查及合金成分的分析研究》，《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第176页。

楚简表明，战国中期的楚国已使用黄金进行贷种、支付等活动。^①从出土的实物来看，楚国的黄金货币被加工成版状或饼形，上面还有钤印的文字，故学界称之为金版、金饼。而河南扶沟出土的铲形银质布币^②，与同时期流通的布币形制相同，则说明白银在当时也具有储藏、支付等功能，应当是完整意义上的货币。

随着战国末期秦渐次扫灭六国，刀币与方足小布、桥形布、楚燕尾布、铜贝、燕齐圆钱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秦“半两”圆钱成为通行全国的法定货币，中国自此进入了流通方穿圆钱的时代。

二 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的研究价值

金属货币作为历史遗物，是研究当时经济、商业发展最直接的史料。东周时期的自然经济虽然占据主要地位，但并不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战国策·齐策四》说孟尝君在薛地放债，一次即可得息钱十万。《战国策》的《秦策》、《韩策》中常可见到“千金之家”、“黄金万溢”、“万金”等字样，这些“金”字有的是指财富而非专指黄金（不排除夸饰成分在内），但也可以反映出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发展之一斑。

对于古代金属货币研究的意义，夏鼐认为：

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古钱学的研究有着更为广泛和重要的意义。古钱学的目标，不仅要判断各种古钱的铸造年代，而且还要通过对钱的型状、质料、质量、铭文、图纹和铸造技术的考察，究明它们的发行者和发行地点，确定它们的价值，研究铭文、图纹的意义和风格，从而为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材料。通过对出土古钱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形的考察，还可以研究世界各地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情景，并为判断当时的交通路线提出线索。^③

①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103~119号关于“贷金”的简文，第147号“为王煮盐于海”的简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② 河南省博物馆、扶沟县文化馆：《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18页。

这段话对于东周时期货币的研究也同样适应。下面试举几例。

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封诊式》20号简记载：“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镒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①，这说明秦国的铸币权是国家专有的，个人不能进行未经允许的钱币铸造活动。这是先秦文献中不曾记载的。因此，认为“在战国时期，货币大概是由商人组织铸造，主要是作为筹码在商品流通的领域中辗转使用”^②的说法是有疑问的。《秦律十八种》有：“赎迁，欲入钱者，日八钱”（《司空》152号简）、“甲盗钱以买丝”（《法律答问》11号简）等记载。可见，钱币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使用得非常广泛，可以购买日用品、牲畜、奴隶以及赎刑等。秦律条文作出种种规定打击偷盗、盗铸等活动，正体现出了这一点。金属铸币对研究东周时代的经济、商业发展非常重要。

金属货币的面部文字中，相当一部分是铸造地的城邑名，大部分见于《史记》、《战国策》等文献记载。这些地名既可以研究战国城市的发展，也为研究当时各诸侯国的疆域及其变迁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比如，三晋及燕国的布币上均铸有地名，这就为研究战国时期三晋各国与燕国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切实的材料；可以利用三晋货币上的地名，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③战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如果再系联同时期玺印、陶文、兵器、竹简等资料中的地名，可补充的城邑名更可多达120余种，其中70余个地名直接记载于《汉书·地理志》。

从铸币城邑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城市的快速发展，与文献中各国大量筑城的记载是相一致的。这些城邑，有一部分是都城、县邑所在地，或商业中心，比如安邑、梁、邯郸、晋阳、周王城等，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商业中心的描述基本相符。从文献记载以及铜器、兵器等资料来看，相当多的县邑所在地不仅铸造铜器、兵器，同时还铸造货币。研究战国货币制度、战国乃至西汉城市及商业的发展，货币文字中的地名是一项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金属铸币也可以为考古学上的分期断代等提供佐证。比如，河南辉县固围村大墓在1929~1930年被盗，墓中只出土了陶器及零星的青铜器，给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第151页。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一章“货币的发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1，第二版，第87页。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断代带来了困难。不过，M1、M2 均出土了“梁冢^①𠄎”一类的桥形布币。发掘报告将墓葬年代定为战国早期^②，或以为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③ 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 290 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魏世家》），前 286 年“魏献安邑”（《秦本纪》）。根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梁冢𠄎”、“梁正币”两种桥形布币出土范围的统计资料判断，在魏国早期领土（陕西、山西西南部等地）上均看不见它们的踪影。这说明“梁冢𠄎”、“梁正币”桥形布币应该是魏国丢失山西西南部之后的铸币。既然固围村大墓中出土了“梁冢𠄎”桥形币，其年代只能在公元前 290 年之后，而不会是发掘报告所定的战国早期。^④

金属铸币上还常有表明重量的文字“𠄎”、“𠄎（𠄎）”、“𠄎”^⑤、“两”、“𠄎（𠄎）”、“朱（𠄎）”、“冢”^⑥ 等，适可与同期铜器铭刻中的记重文字相对照，这为研究东周时期的衡制与货币交换比值、重量单位的变革等提供了依据。

总之，东周金属货币对研究经济史、战国历史地理、古文学、考古以及度量衡等领域都具有相当的价值。

三 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书所说的“东周金属货币”，不仅包括布币、圆钱等铸币形态，也包括金版等称量货币形态。通常情况下，钱币是指铸币形态的货币，而货币既可以指铸币，也可以指非铸币形态（诸如布帛、谷物甚至金银等）。古钱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对钱币资料的搜集、鉴别和考订”^{*}，包括钱币的形状、大小、质量、文字、国别与年代、地望、真伪等；货币史则是将钱币置于历史的流通领域背景之下，考察其流通方式、价值与价格、储藏

① 吴振武：《说梁重𠄎布》，《中国钱币》1991 年第 2 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③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第 56 页。

④ 吴良宝：《谈货币出土因素的功用》，《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 73 页。

⑤ 吴振武：《战国货币铭文中的“刀”》，《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第 317 页。

⑥ 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古钱学”条，吴荣曾撰，第 144 页。

与信用、支付与比价等。因此,研究东周金属货币,在古钱学、货币史两个方面都不可忽视。不过,由于资料与研究手段的限制,本书讨论的重点还是偏重于古钱学的领域,同时尽可能地进行东周货币制度方面的探索。至于完整的东周货币史的撰写,还有待于各种条件的成熟。

目前的东周金属货币研究,不论在内容或方法上都已经摆脱了传统古钱学的框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①,此不赘述。总起来看,研究东周金属货币,离不开古文字、考古、科技史、历史地理等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成果。下面试加说明。

东周金属货币上的文字,大都属于战国文字。随着古文字学者将货币文字纳入研究视野,币文释读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此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周金属铸币研究的进展。比如“梁冢新百当乎”桥形布币、中山王器的出土确认了币文中的“百”字^②,加上“冢(重)”字的正确释读,才使得我们可以真正地理解币文的含义。另外,像齐刀币中的“𠄎”字^③、桥形布中的“𠄎”字^④、方足小布中的“𠄎”字^⑤以及三孔布文字^⑥、齐“明”刀背文的释读^⑦等,都离不开古文字学的研究。一些疑难币文的考证也得益于古文字考释的方法,比如利用借货币边框为笔画、文字借笔、省形等特点考释方足小布中的“长子”等。^⑧

东周金属货币的研究也离不开考古学的方法与成果。作为考古发掘中的出土物,可以使用考古学上的层位、类型等方法为东周金属货币进行断

① 张文芳、吴良宝:《二十世纪先秦货币研究述评》,《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王贵忱:《清末民国时期的钱币学》,《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一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李雪梅:《民国时期的泉币学社》,《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

② 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

③ 吴振武:《战国货币铭文中的“刀”》,《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

④ 李家浩:《战国货币文字中的“𠄎”和“比”》,《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

⑤ 李家浩:《战国布考》,《古文字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0,第161页。

⑥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李家浩:《战国布正布考》,《中国钱币》1986年第4期。何琳仪:《三孔布币考》,《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

⑦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裘锡圭、李家浩:《战国平阳刀币考》,《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吴振武:《谈新近公布的两枚战国齐莒刀》,《文物研究》第四辑,黄山书社,1988,第140~141页。李家浩:《战国莒刀新考》,《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⑧ 黄锡全:《古币二辨》,《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第201页。吴良宝:《战国布币释读三则》,《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第133页。

代。比如洛阳地区随葬平肩空首布币的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墓葬^①，不仅明确了大、中型平肩空首布铸行于春秋晚期，而且使我们对《国语·周语》周景王“铸大钱”以及“子母相权”的记载有了更辩证的认识（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考古学的成果有时可以为东周金属货币中的国别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比如春秋晚期的尖首刀，旧以为燕币或戎狄之物。根据河北北部随葬尖首刀币的春秋晚期墓葬资料，以及从甘、陕、蒙、晋直至冀北地区出土的“秦式剑”、虎形牌饰、异型釜等物，可以看出尖首刀币确是由陕北、内蒙古昭盟、晋北到达河北的狄族所铸造。^② 这一研究为尖首刀“狄刀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如果单纯地依靠货币本身的资料还是不足以使人信服的。另外，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到货币研究之中，比如“类方足布”与“类圆足布”的判定、各种布币的演变序列等等^③，此不详述。

三晋布币、圆钱等货币上铸有铸币城邑的地名，有的直接见于史书记载，有的通假破读之后也可以知道是何地，这对于判定这种货币的铸造时间、国别都很重要。比如通过对三孔布面文的考释发现，可以确认的三孔布上的地名“几乎都在赵国东半部，常见于赵国尖足布或方足布上的西半部的地名……在三孔布上几乎看不到。看来这种布币很可能是在赵的太原地区被秦攻占之后才铸造行的”。^④ 另外，历史地理知识还可以帮助我们检验部分地名考证的可信度。比如，通过考察疆域变迁与铸造时间、出土地范围等因素可知，方足小布中的“咎奴、寿阴”等地望的考订，目前比较流行的解释都是有问题的。

货币出土地的相关信息在研究中虽然处于辅助性的地位，但它在判断国别、时代先后以及检验成说的可信度等问题上都有相应的价值。比如，“梁冢新”类桥形布的铸造年代，或定在魏迁都大梁之时，通过考察这种布币出土地的范围可知，其铸造时间不会早于魏国丢失旧都安邑的前 286 年。^⑤

① 蔡运章等：《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 25～26 页。

② 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 96～98 页。

③ 吴良宝：《谈几种平首布币的形制关系》，《江汉考古》1998 年第 3 期。

④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 年第 2 期。

⑤ 吴良宝：《谈货币出土地因素的功用》，《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 73 页。